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飞跃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经济史室副主任，河南大学黄河学者 王瑞芳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大胆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其中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认识的发展，堪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典范。

中国现代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中共在相当长时期内对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认识模糊。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将资本主义及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加以反对，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灾难。

全面抗战开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认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左”倾错误的惨痛教训，对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特性作了深入思考，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1939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现在大大的压制资本家，不许他们发展，

这种办法是不利的，对革命等等都不好，结果没几天连一个工厂也没有了，那不好，至于我的意见对不对呢？还值得同志们研究一下。”他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问题初步研究后的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地方，能不能有资本主义生长呢？能的！如果我们今天消灭资本主义，那干什么呢？干社会主义吗，这是一个空的，这个思想不能实现，这是不能的。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但现在还不成，所以便可以让资本主义发展，不过要调剂他的发展。”（毛泽东：《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东北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四），第158页）。这种意见，实际上改变了此前中共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态度。

1939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开始肯定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他在随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批驳了“左”倾空谈主

义，肯定了要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在中共看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利用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到1944年夏，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更为明晰。他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时申明：“我们坚决相信，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广大发展。”他明确指出，中共在现阶段的近期目标，是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完成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任务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同年8月31日，毛泽东致函《解放日报》报社社长秦邦宪，明确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他说：“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工厂,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革命的任务。”(毛泽东:《致秦邦宪》,《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马克思主义认为,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可能到社会主义,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但并不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统治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将机器、工厂和合作社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包含着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容,指明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又吸收资本主义成就的新道路。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而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是排斥资本主义,而是要大胆地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060页)。他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他重申:“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他解释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因为中共七大开会时已经把《论联合政府》印成书面报告发给大家,所以毛泽东没有再照本子念,而是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来解释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他在谈到“资本主义”问题时,专门解释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他区分了大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明确指出对大资产阶级采取没收政策,但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允许广泛发展”。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不顾中国

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发展状况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多处使用了允许一般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提法,此处所谓资本主义“广大发展”,主要指一般资本主义企业的广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并不是短暂的,而将是长期的;因为中国“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否则,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关于这个“漫长的”时期,据斯特朗报道说:“会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多久呢?毛泽东说它将长时期存在。他在一个地方说‘几十年’;在另一个地方说,因为中国比较落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将会比今日欧洲的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得更为长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理论阐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该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也是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大贡献。